

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与中国的应对^{*}

——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教授

李江静

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1931—2018 年), 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同时也是活跃的左翼社会活动家。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 获经济哲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 曾任教于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等。代表作有《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 年)、《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1973 年)、《帝国主义的危机》(1975 年)、《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发展》(1976 年)、《价值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1977 年)、《资本主义的危机》(2003 年)、《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2005 年) 等。

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 2018 年 5 月 6 日在北京大学“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的发言和 2018 年 5 月 7 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均指出,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即“危机中的资本主义”, 使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持续运行。资本主义总共经历过两次系统性危机, 并且都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为应对危机, 资本主义采取了相应措施, 如加强垄断资本主义的力量、推进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等, 但这些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调适性政策, 不仅继续制造了不平等, 而且不断暴露了其自身的不可持续性。据此, 阿明认为, 我们真正的任务不是找到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办法, 而是彻底摆脱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笔者通过对萨米尔·阿明教授的访谈, 整理出了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当代变化以及中国应有的应对措施等几个问题的具体看法。在文章编发过程中, 我们惊闻阿明教授不幸于 2018 年 8 月 12 日在法国巴黎去世, 享年 86 岁。谨以此文悼念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思想家, 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米尔·阿明教授。

一、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短暂过渡时期

▲ (采访者简称▲, 下同): 阿明教授, 您好! 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您曾说过, 在您的一生中, 从 20 多岁到 80 多岁, 总共四次通读过马克思的所有著作, 碰巧每次都正经历世界旧秩序的重大变革, 因此每次重读马克思的学说, 都能从中收获很多心得。今年恰逢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能

^{*} 本文系 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研究”(2015MZD04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64 批面上—等资助项目(2017M620057) 的阶段性成果。

否请您首先谈一下，您怎样看待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代的意义？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我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对当代的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马克思的确是个天才，他的学说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那只是开始，我们应该以此为起点，继续深入分析世界的变化。然而，在现实中，不同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往往有不同见解。对此，重要的不是被某一种框架所束缚，陷入仅仅停留在头脑中的“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纷争，而是要了解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人们为什么会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不同认识。这正如大学教授教导学生一样，关键不在于告诉学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在于教会学生理解不同的事物、观点，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同。因此，一个探讨问题的基本原则，便是抛开纯粹理论上的“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纷争，从马克思的学说出发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在直接回答你的提问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认识这样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的国家、社会和人民，在现在以及可预见的将来，将要面临什么样的重大挑战？如何认清这些挑战和寻求有效的措施来应对挑战？第二，世界人民，尤其是全球的劳动人民，现在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为什么无论对于“南方国家”还是对于“北方国家”^①的大多数人，我们都需要重新激活国际主义？这里的国际主义不仅是就思想道德层面而言，而且是指要落实到具体组织上的、能够建立起来的、代表全球劳动人民的国际组织。为了更好地理解前述挑战，以及为探讨它们的价值提供有力的论据支撑，我想先绕个弯子，从资本主义开始谈起。

▲：资本主义目前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发展，这是一个并不短暂的时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结合马克思主义，具体来说结合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呢？

●：的确，资本主义到目前经历了三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个时期看似很长，但相比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的悠久历史而言，它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短暂过渡时期。19世纪是资本主义的上升期，这是一个经历了工业化、法国大革命等历史事件的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迅速发展。但到了19世纪末，就像列宁所分析的那样，垄断资本开始出现，垄断资本的不断发展使得资本的集中控制程度更高，由此导致的一个新现象便是金融化。金融化意味着非生产性的经济活动和资本的集中控制，这就将一个新的内在矛盾引入了资本主义——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状况和资本积累过程的再生产状况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金融化的程度增长非常之快，像癌症一样，是指数级的；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的速度却非常慢，尤其是处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三大寡头，美国、日本和欧洲，面临着高度金融化和缺乏增长的突出矛盾。这个新的内在矛盾使得资本主义体系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生态上都无法长久维持。

在当代，资本主义正面临着一种系统性危机，我们称之为“危机中的资本主义”，这使资本主义世界处在危险的境地。要深刻认识这一点，就有必要首先理解两个大不相同的概念：“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并对二者做出区分。“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指资本主义内在的、持续的多种危机，从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到阶级斗争以及历史的危机，资本主义有能力解决这些危机并继续前行。“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是指尽管资本主义可以继续发展延续，然而，它已经成为“明日黄花”，进入了衰老阶段，不再具有进步意义。迫切需要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来替代资本主义，不仅为南方国家的人民，还为全世界的人民。

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期，他是怎么看到了这一点并坚定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人

^①“南方国家”一般泛指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主要分布在南半球而得名；“北方国家”相对“南方国家”而言，一般指发达国家，又称作工业化国家、高经济开发国家（MEDC）——访谈者注。

类历史上的一个短暂过渡时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归根结底，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这一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除了分析阶级矛盾，还将资本主义生产分为两个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与生活资料的生产，并探讨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他运用数字分析了资本主义想要持续扩大再生产所必须的条件，例如，保证每年3%的增长率，并且论述了这一条件与其他一些因素紧密相连，其中包括劳动分工、生产一般商品的设备以及生产消费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等。这就导致一些人肤浅地认为，只要具备这些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就可以永久运行下去，至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行之有效，并因此赋予了资本主义以合法性。马克思批判这种思想为庸俗经济学。因为，这些人无法证明资本主义能够实现市场的一般均衡，尽管他们假设了这种情况并提出一套看似完美的理论，但不论是在马克思之前还是在之后，从来没有经济学家可以证明资本主义具有实现市场一般均衡的内在力量。包括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他们虽然得出过很多重要的结论，学术界也认可他们的结论，但他们一样无法证明资本主义具有这种达到自我均衡的能力。与这些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从一种不均衡向另一种不均衡发展，并不会达到任何均衡。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证明了资本主义是要尽可能压低工资，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并证明了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矛盾，而矛盾的发展最终会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使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持续运行。

二、资本主义衰落的趋势长期存在

▲：正如您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不可持续性。资本主义采取过哪些相应措施来应对危机，这些措施从多大程度上解决了问题？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那时资本主义制度只覆盖了世界极少数国家和地区，例如，英格兰（还未覆盖整个英国）、法国的东北部、比利时等，即使在欧洲也不占据主流地位。但就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已经预测到了资本主义的未来。他认为，资本主义将在几十年间迅速征服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但对世界的征服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到达终点的过程，资本主义将走向衰老，人类社会需要一个更高级的制度来取代它。历史正如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几十年间，从北美、欧洲再到亚洲的日本等地，都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扩张也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加深了对世界的控制和统治，引发了殖民战争，例如，中国在1840年就被动地卷入了殖民战争，在那以后，亚洲和非洲的其他国家也都卷入了被殖民化的进程中，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事实上，殖民战争正是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产物，尽管资本主义也曾通过殖民扩张有效缓解了危机，但这仅仅是转嫁危机的一种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回顾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总共有两次，第一次危机始于1875年，持续了几十年，第二次危机始于1975年，至今仍在持续，两场危机经历的时间都很长。我们可以将其称作资本主义制度危机，或“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如前所述，殖民扩张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内部调适的方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是如何得以克服的？其实，促使克服这次危机的历史事件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1929年经济大衰退、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中国革命、万隆会议以及亚非拉各国的独立等。其中的一些历史事件是有积极意义的，如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亚非拉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一些历史

事件却有极大的消极意义，如德国纳粹、军国主义。这一系列事件都是人们在克服危机时采取的斗争性手段，而单纯依靠殖民扩张，甚至是通过资本主义内部政治、经济政策上的调整都不能改变局面，这是资本主义步入衰老期的标志。

在面临第二次长期的系统性危机时，资本主义的应对方式与前一次是相似的，但又处于不同的情形中。首先，从1975年到1990年间，垄断资本主义发生了质的变化，全面加深了其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霸权。在第一次危机时，资本主义已经向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过渡，而在第二次危机中，垄断资本主义实现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不再局限于经济上，还包括政治、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控制，形成了整合的力量。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垄断资本主义的控制导致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被转变为一种分包形式，使越来越多的公司、农民甚至个人只在表面上成为了更具独立性的个体，实际上却沦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分包人。例如农民，他们虽然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但他们上游的贷款渠道以及下游的销售环节都被垄断资本集团控制了，因此，农产品的价格实际上就由垄断资本家所控制，而不是由市场决定，最终获得的收益也大多流进了垄断资本家的腰包。伴随着经济上的变化，政治上也出现相应变化，西方政治体制的民主性开始衰弱，美国、日本、欧洲这三大资本主义寡头开始出现，垄断资本主义由此在资本和权力方面都实现了集中。

其次，推进了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它的出现要早于资本主义的诞生，并长期存在于历史发展进程中。在第二次危机中，全球化向着更为纵深的方向发展，例如，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向全球投资开放，将全球的工业和农业等纳入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中，使全球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当代的全球化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大型国际金融组织和欧盟、美国等强大力量的支持，最终巩固了跨国垄断集团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秩序的控制。

最后，加速了经济金融化的进程。在应对第一次危机时，资本主义就采取了金融化的手段加强对世界的统治；第二次危机中，金融化向着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在垄断资本集团的控制下，大部分的剩余价值不再投入生产系统，追逐更多利润增长的内驱力又促使他们不断地进行投资、再投资。在过去的资本主义结构中，好的资本力量是投入到生产环节的资本，而投机的资本力量则仅仅关注金融业务。但是，在最近的20—40年间，“金融投资”一直以迅猛的速率在膨胀，完全与实体生产投资相脱节，GDP增长大部分变成虚拟增长。这使得我们现在面临大量的金融泡沫，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在不断加深，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调适性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体系在持续制造不平等的同时，也不断暴露了其自身的不可持续性。但是，资本主义并不会像人一样自然走向死亡，而是会在衰老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凶猛，甚至为求生存不惜一切代价。这意味着我们将面临的不是一个和平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结束统治的时代，相反，我们很可能会进入一个战争时代，一个充斥着革命、反革命与暴力的时代。

三、集体帝国主义的形及其带来的挑战

▲：前面您提到，当代资本主义是普遍化垄断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的不断发又使得资本的集中控制程度更高。能否结合现实谈谈，在资本日益集中的趋势下，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是否回应了您提出的“中国的国家、社会和人民面临什么样的重大

挑战”，以及“世界人民，尤其是全球的劳动人民，现在面临着怎样的挑战”这样两个问题？

●：在资本日益集中的趋势下，帝国主义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世界上存在英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俄国帝国主义等，他们之间的矛盾引起了世界大战。但现在，资本越来越集中到美国、日本和西欧三巨头的手中，他们的经济利益已经被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力量整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集体性的帝国主义。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重大变化，更是国际政治层面的重大变化，以美国、日本和西欧为代表的集体性的帝国主义一旦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剥夺能力和剥夺效率就大大提升了，并且他们内部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了。那么，这种帝国主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什么证据证明？其实我们通过非常直观的方式就能看到集体帝国主义的证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集体帝国主义建立了一个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拥有联盟的领导权，还有一些从属国家。这些从属国家可能对联盟的某些情况不太满意，但他们最终会服从美国总统的命令，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加清楚，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已经无法继续维持统治地位，只有协助并服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才能实施其对抗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战略。

在集体帝国主义内部，集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不仅控制了社会经济，而且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美国等国家的左、右两翼的政党都已被其俘虏，西方政治体制的民主性不断被削弱。20世纪40年代，在一些国家还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党，当时他们引入了很多针对工人阶级的社会福利，但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名存实亡，演变成了所谓的“社会自由主义党”。当政党开始遵循自由主义的原则时，便很难再照顾到社会的利益，因为这两者本身是矛盾的。这也使得资产阶级民主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同时，还需要指出，资本主义的自由也不属于劳动阶级，尽管有多党制，公民有投票权，但投票之后的第二天国会依然要服从市场，也即要服从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公民的这种权利有很大局限性。很多经济学家被垄断资本主义所俘虏，说出的是一样的东西，选出的是一样的代表。不止于此，我们同时看到，传媒与文化也都被俘虏了。过去，媒体传播的内容十分丰富，包罗万象，但现在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内容，一成不变。在文化上，我们不再主动思考，变成了被动的围观者，我们乖乖工作，接受现实，其实是被一种软性的集权主义所钳制了，但是当我们开始反抗时，这种软性的集权主义又会变成一种硬性的手段，例如，通过警察、军队来镇压我们的反抗。

基于被整合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夺需求，集体帝国主义对外加深了对全球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控制，以全球化的形式，确保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力量能从资本剥削劳动所榨取的巨额剩余价值收取到垄断租^①。这些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区活动，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被卷入到全球化的体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亚洲（包括中国）、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85%，但我们是被控制的。并且，快速的经济增长看似已转移至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些国家都受到垄断资本力量的控制和剥削^②。

因此，我们都应该摒弃天真的想法，认为可以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赶超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际的情况是，集体帝国主义不会容忍我们赶超他们，更不可能对我们心存善念或坐以待毙。尤其对于中国而言，要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如果继续向着自己的目标在全球体系中发展，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集体帝国主义不会放任中国崛起，这使得中国将会遭受更为严峻的外部挑战，

① 参见〔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页——访谈者注。

② 阿明指出，观察当前危机阶段的对比现象——中心国家及地区（美、欧、日）的微弱增长和外围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增长，必须分析剩余是如何被吸收的，以及帝国主义垄断利润是如何被抽取的，只有根据把这两者的分析联系起来的整体分析，才能观察清楚。参见〔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页——访谈者注。

甚至很可能会面临战争。因此，面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我们的任务不是找到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办法，而是要彻底摆脱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尽管这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

四、中国的有效应对措施

▲：从您的讲述中我们知道，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已经形成的集体帝国主义，他们对内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控制，对外加深了对全球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剥削。面对来自集体帝国主义的严峻挑战，中国应当如何应对？您有什么样的具体建议？

●：正如前面所说，集体帝国主义难以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中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目前，以美国为首的集体帝国主义仅仅通过“无核化”的借口，就在中国的东北边和西边造成了极大威胁。在中国东北边的朝鲜以及在中国西边的伊朗，美国以推进这两个地区无核化的名义对其展开了制裁，这两个国家紧邻中国，他们攻击的最终目标事实上是中国。他们还说过，将继续支持达赖喇嘛搞所谓的“西藏独立”，以及支持新疆的极端宗教势力。同时，据相关文件记载，他们甚至曾计划分裂中国，在这些已经部分公诸于世的文件中，包括了一份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的针对中国的核攻击文件，上面写道，“一旦对中国展开核攻击，可以置六亿中国人于死地”。那么，面对挑战，中国应该如何行动？我认为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

第一，丢掉幻想，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要对现在的状况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即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欧洲这三大资本主义寡头都不会接纳中国和允许中国崛起。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天真地以为抛弃社会主义并转向以西方为蓝本的资本主义，就会被西方全盘接受，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从历史教训中，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不会轻易接受中国的成功。如果中国无条件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美国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向资本主义屈服，甚至自愿成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将迅速地摧毁中国。假如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一目标能够达到，中国就会变成一个为集体帝国主义提供原料的从属国。

第二，谨慎对待金融全球化。1979年以来，中国开始融入贸易全球化的大潮，进出口贸易急速增长。这一时期，中国不仅开始了资本投资的全球化，开始允许国内资本在国外购买资产，而且引进并接受了外国资本。但同时，中国也制定了一些规则来规范投资的全球化，例如，外资企业不能在中国为所欲为，他们的行为需要经过政府批准，需要提交关于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的报告，等等，这都是中国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尽管这些措施是否有效，是否会影响合作效率，还需要认真研究，不过非常有利的一点是，中国还没有参与金融全球化，中国的银行系统（即国有银行）仍然是国家持股的，而且人民币汇率也由中国人民银行管控，也即被中国政府（而不是市场）管控。当前，用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的GDP占全球的18%，按照国际汇率法以现价美元衡量时，则占15%，相差无几。再来看印度，其金融全球化的程度在近年来不断加深，按购买力平价来算，印度的GDP占全球的7%，差不多是中国的一半，但是，按照国际汇率法以现价美元衡量时，这一数字却还不到3%^①。这意味着，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已经将印度转化成了他们的分包人。所以，必须要看到的一点是，中国现在手中有一个武器，这就是没有参与金融全球化。为什么要把武器交到敌人手中呢？中

^① 根据世界银行（<http://www.worldbank.org/>）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用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的GDP占全球的17.73%，按照国际汇率法以现价美元衡量则占全球14.76%。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印度GDP占全球的7.21%，按照国际汇率法以现价美元衡量则占全球2.98%——访谈者注。

国只要拿好这一武器，就能够避免由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动荡和变迁。

第三，不要放弃土地非商品化的原则。中国的土地分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两种。一些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村委会管理，农民基本上能够平等使用土地。中国坚持了土地非商品化的原则，这是中国手中的另一个武器。为什么土地不能商品化？这是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的可耕地面积占7%，却要供养差不多占世界19%的人口数量，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更合理地使用土地。举个例子，巴西拥有的可耕地面积约占世界的5.6%，供养的人口数量还不到世界的3%，人口和土地的比例比中国的情况要好四五倍^①，但巴西有10%的人口非常贫穷，而且有2/3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②。中国虽然还不富裕，但没有大范围的贫穷人口，这与巴西到处都有大量的贫穷人口形成鲜明对比。

第四，主动反抗资本主义的三个寡头，即美国、日本和欧洲。不可否认，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抗争的作为，尽管这些作为有其积极意义，但它们都停留在防御性阶段，还没有发展到主动出击的阶段。其实，更理想的情况是，我们采取主动的策略来迫使敌人被动调整其策略。要认识到人类发展的历史是很漫长的，资本主义衰退的时期也会很长，因此，在地区层面，各地区也应该联合起来壮大力量，而不是分散行动。这正如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不一定是好的，但通过斗争产生的政府势必会打破各方势力的平衡那样。在全球层面，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还参与了第一国际的创立。第一国际不仅传承了联合起来的组织性，还传承了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合作的人文精神。此后，欧洲的工人阶级发展了第二国际；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又建立了第三国际，把欧洲工人阶级之外的亚非拉工人阶级也囊括进其中。当下，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在呼吁建立一个国际，来实施共同的战略，寻求共同的胜利。我们不一定要高举“革命”的旗帜，但应该有进取的精神。这也是我认为需要重新激活国际主义的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学说在当代越来越焕发出真理的光芒，我们日益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而是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因此我们要用团结取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竞争，这种竞争不是指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指阶级之间的斗争和国家之间的斗争。我们追求的团结是人与人之间、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团结，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有耐心和坚定的方向，今天的乌托邦会变成明天的现实。

（访谈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编辑：张 剑）

^① 根据世界银行（<http://www.worldbank.org/>）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中国拥有世界上约为8.35%的可耕地面积，供养约为8.35%的人口数量；巴西拥有世界上约为5.61%的可耕地面积，供养约为2.79%的人口数量——访谈者注。

^② 巴西有10%的人口“非常贫穷”和有2/3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为阿明在2018年5月7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提供的数据。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自从采用新的贫困线指标后，如果按照每天消费在5.5美元以下的贫困标准，截至2017年，巴西贫困人口的数量由原来的890万人增长到4550万人，占巴西总人口的22%——访谈者注。